

劉錚雲，《檔案中的歷史：清代政治與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527頁。

《檔案中的歷史：清代政治與社會》（以下簡稱《檔案中的歷史》）是臺灣地區的歷史學家、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劉錚雲的研究成果集，收錄19篇論文。作者根據清代檔案對清代政治制度和基層社會管理、秘密結社、人口流動、社會關係等方面的論題進行深入考察，亦對其在史料整理中發現的檔案材料本身的特點和問題進行探討。

作者長期注重利用檔案來討論、研究清代歷史，關注點側重基層社會管理及社會關係，特別是地方基層政府的運作模式，以及士紳群體與官府、會黨等之間的互動聯繫，以此展現當時的社會狀態。在他看來，很多檔案中的案例引人入勝且富有價值，但如同散落的珠子需穿針引線，檔案材料亦須通過問題的脈絡加以貫通串聯。因此，他注重從檔案的細節入手，嘗試在大量的材料中抽絲剝繭、提煉問題，這也是本書所收錄的論文的一個共有特點。

本書分為上、中、下三編。第一編「檔案中的清代政治」包含五篇論文，重點關注兩個問題：一是從「沖、繁、疲、難」的政區等制度設置，考察清代中央與地方在地方官員人事調動問題上的互動，並探討其特點；二是從鄉地保甲制度探析清代的基層治理情況。

「沖、繁、疲、難」之制是清代地方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份，依據地方實際情況劃定不同等級，再派任不同的官員前往地方任職，是一種較為靈活的人才任用機制。該制度實際執行的過程，在作者看來實際上是一場中央與地方人事控制權的角逐。雍正時期此項方案提出，將近四年後才給出覆奏，正式實行的方案大大削減督撫在該項制度的自由度，即只有「沖、繁、疲、難」佔四項或三項的缺才歸地方調補，吏部仍然掌控大部份的銓選權。在這個過程當中，作者關注到皇權的參與，督撫往往可以直接和皇帝互動，地方大員直接向皇帝申請員缺，或要求更改地方等級的案例層出不窮。皇帝在此過程中擁有至高無上的決定權，「特旨」是皇帝掌握實權的一種方式，不論推行什麼樣的制度，皇帝的旨意始終凌駕於其上。在作者分析的實際案例當中，皇帝的參與往往顯得不遵守規則，而這恰恰是整個制度靈活性的一種體現。皇帝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保持對地方的實際控制。

鄉地保甲是作者關注的另一個重點，鄉約與保甲制度長期以來受到學界的關注，部份觀點認為保甲制是清朝沿襲明朝的里甲制，和鄉約一同成為

「在官人役」，「地」則是許多地方保長之上的又一個上級「地方」，因此也有「地保」的說法。作者提出，在清代檔案中呈現的制度情態，並非井然有序，其確立過程先後不一，具體實踐參差不齊。同時，中央對於地方推行制度的監管並不嚴格，缺乏統一規範，往往是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便宜行事，很難歸結出一個系統、具體的制度形態。地方官和鄉保甲長的關係十分微妙，在地方，鄉地保甲長是政府的代理人，直接面對民眾，處理具體管理工作；但是對於州縣來說，與他們的斡旋比指派差役更為重要。在作者看來，保甲對於政府來說是地方督催糧務與緝盜安良的任務執行方，其系統結構其實沒有那麼重要；而且，充任鄉保甲長的人很多是「市井無賴」，他們既被官府方面「擠壓」，也在「擠壓」普通人當中獲利，始終無法進入真正的官員系統，其實也是中央不願意看到的。在這一點上，中央和地方隱有分歧，作者在結語中尚未對此大問題做更多引申討論。有關於鄉地保甲，基層社會與之錯綜複雜的關係太多，作者提到的每一個個案都有自己的特點，作者僅希望通過檔案中的具體機制一窺清代地方社會治理之概觀，同時進一步思考這樣的情態為我們理解清代基層國家的社會治理能帶來什麼幫助，也即是他在書中提到的，國家如何掌控基層社會？

在本書的中編，作者收錄的論文重點關注秘密結社問題，通過分析四川異姓結拜、直隸老理會、哥老會等案例考察清代會黨的狀況，主張從社會關係的角度去追述會黨存在和發展的過程。同樣的，在作者看來每一個案例都有其特性，四川嚶嚶是外來移民和雇工等邊緣人組成的組織，以掠奪為主，鮮與其他社會組織產生關係，實際上是為這些外來的孤單個體提供家族和社群組織的替代。相較於後來的哥老會，嚶嚶是一個單純的為生存活躍的團體。關於老理會，作者利用一些會眾被捕之後的口供來做研究，認為這是一個屬於「白蓮教系統的會黨，活動形式比較鬆散隨意，不論是組織形式還是對成員的控制都很簡單，建立在師徒關係之上，容易趨向鬆散或者分裂出其他教派」。作者認為這能夠反映出當時的一個普遍情況，即聚散無常帶來各種組織的「生生不息」。作者還認為，傳徒以聚斂錢財或許是這樣小會黨發展的一個大的動力，這樣的結構打破了施堅雅以集市為關係中心的模型。

關於哥老會的起源是作者關注的另一專題，通過分析清代中期檔案的不同材料，指出早期的哥老會是仿照四川嚶嚶、紅錢會等會黨形成的組織，這樣的組織在當時的社會上並非特例，而是在一個區域內廣泛流行。在湘軍發展的過程中，曾國藩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效仿會黨形式建立組織。因

此，哥老會應當屬於四川、湖南等地會黨系統的一部份（有別於福建、廣東等地的天地會系統），它以個人人際關係為主要的連接點，實際上的組織動員能力不高。關於會黨的形成和發展動因，作者分析清代會黨組織的時空分佈，進行資料分析，嘗試從經濟的角度考察看待。清朝進入發展疲怠期之後，「人多地少」的情況影響人口遷移，進而催生這種類宗族、甚至帶有劫掠性組織的出現。作者不贊成關於抗清意識覺醒這類的判斷，而是在政治和經濟因素之間找到社會根源，並且側重經濟原因的分析。在活動空間問題上，作者根據前文分析出的「沖、繁、疲、難」設置來反觀會黨活動的活躍範圍，考察不同會黨活動的地區特徵。他發現會黨在被界定為「繁、重、難」的地區活躍度比「疲」的地區要高，這也說明，政務繁忙錯雜、交通要道、民風難治的地區會更為活躍，而相對不那麼富庶的地區則較為安靜，因此印證作者在前面提出的經濟因素對於會黨活動的主導型觀點。根據作者的觀察，清代會黨動員組織雖然能力有限，但在基層社會當中仍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勢力，會黨與官府、鄉紳的關係也是作者密切關注的重點。從檔案材料來看，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十分複雜，各方勢力時而相互對立，時而融合並互為利用。中編的最後兩篇論文是關於清代商販和夫妻關係的研究，他特別關注商販這個群體在傳統城鄉文化交流中扮演的重要的溝通角色。

本書下編是作者關於清代檔案材料的一些研究，總共七篇，是對目前檔案材料做出的辨析和討論，作者主要思考如何利用這些材料去發現和解決問題。他認為，檔案材料雖然豐富，細節眾多，但應該對材料加以考辨，站在材料產生方（如記錄者、說話方等）的角度思考材料的合理性，如作者提到的口供材料，雖然可以從中發現很多基層社會的詳細剪影，但受人為局限很大，因此必須結合其他的檔案材料思考才能有所洞察和創獲。

本書收錄的是作者1985至2015年的部份論文作品，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從中能夠看出作者思考方向的一脈相承和持續推進，基層制度與社會關係是主要的研究視角，從不同群體之間社會聯繫的細節部份出發分析問題，是作者擅長的研究方法。對於檔案研究，作者亦喜用統計學的方法獲得一些與傳統看法相悖的結論，注重比較不同因素對某個現象的影響程度。在最後一篇文章〈也是歷史〉中，作者展現他利用檔案材料的功力，通過檔案材料去還原四個女人的故事，強調當時女性的生存狀態，依賴於男性，無法自主做出決定，並且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抱有這樣的心態。或許在作者看來，能夠形象生動地講出一個清代的小人物的故事，才是利用檔案的更高境界。作者亦提到他近年的研究計劃，是繼續深入探討底層民眾社會問題，試圖接近清代最

基層人物的真實生活，從冰冷繁雜的檔案中還原最鮮活的歷史場景。對於這一研究路徑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我們期待作者的後續成果。

杜翼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楊品優，《科舉會社、州縣官紳與區域社會——清代民國江西賓興會的社會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279頁。

無論從何種角度探討清代民國賓興會的歷史，一般都繞不開楊聯陞（1914-1990）1961年為清華校長梅貽琦（1889-1962）祝壽所作的〈科舉時代的赴考旅費問題〉（《清華學報》，第2卷，第2期〔1961年6月〕，頁116-130）。在這份開拓性的研究中，楊聯陞討論唐宋以至清代赴考士子籌措旅費的各種方式，賓興會助學即其中之一。他不僅深刻揭示「賓興」由「官紳士民公建」、具有「人民自治」的特質，還敏銳地點明未來兩種可供繼續開拓的研究方向：一是從「社會經濟史方面」討論基金觀念、發商生息舉動、紳商士民自治等，二是從「史地關係」討論地域人文與義舉互為因果的關係。可以說，楊聯陞已經注意到，要進一步揭示賓興助學的機制，必須將之聯繫到資金的運轉、人的活動以及產生的具體地域社會背景。循此脈絡，讀者不難看到，不管研究者自身是否意識到，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這項議題的研究，實際上都沒有超越前述楊聯陞提示的思路。問題在於，如何推進資料，積累史實，揭示賓興助學發生、發展機制，在深度和廣度上回應楊聯陞的洞見。目前為止，楊品優的新著《科舉會社、州縣官紳與區域社會——清代民國江西賓興會的社會史研究》（以下簡稱「楊著」）可能是把上述兩個方向結合得最為密切的成果，從而提供這個研究領域最有深度的認識。

除緒論、結語外，楊著共分五章。全書的撰寫架構以時間為軸線，依序討論清代至民國時期江西地區賓興會興起、發展、轉變和消亡的過程。作者開宗明義指出，對這一科舉會社發展演變歷史的分析，着眼點是「晚清以來國家與社會關係」，目的是揭示「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的內在機制（頁3）。他批評以往的研究「未能關注賓興會興起的制度與社會背景」，「沒有從嘉道以來王朝國家的大歷史看賓興會」，因此是「孤立的、獨立的、個案的分析」，「這樣的研究無法再現那個大的歷史與時代」（頁22）。